

物象化世界的内在结构

——广松涉解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目的与意义

□ 王庆丰 董键铭

摘要:广松涉解读马克思《资本论》并不仅仅想澄清《资本论》本身的思想,其最终目的是想揭示全部生活世界的物象化结构。在广松涉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区别的根源就在于两者持有不同的研究立场:“当事者的立场”与“学理的立场”。所谓“从当事者的立场”指的是研究者自觉地将意识与商品交换活动中的当事者保持一致,而“从学理的立场”指的则是研究者自觉地将自己的意识与当事者分离开来。广松涉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从学理的立场”出发,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商品世界的四肢结构。在商品世界与其他世界的存在结构的类比中,广松涉进而把四肢结构理论推广为整个生活世界的解释原则,从而揭示了物象化世界的内在结构。这就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从学理的立场;四肢结构;商品世界;现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6)05-0050-08

广松涉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并不仅仅是想澄清《资本论》的思想原像,更为重要的是,他试图通过研究《资本论》揭示马克思独特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内在结构。因此,对于广松涉来说,解读《资本论》不是其最终目的,而只是途径和方法。正是通过对《资本论》的解读,广松涉为自己的理论大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知道,广松涉哲学体系的基本特点,表现为以“关系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解释整个世界的存在结构。这一过程的起点就始于广松涉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世界的存在结构的分析。

在对马克思价值形式论的重现中,广松涉指出马克思持有一种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独特立场——“从学理的立场”。马克思正是以这种研究方法为基础,阐明了商品世界的“四肢结构”。与其说“四肢结构理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呈现的理论和方法,不如说是广松涉通过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捕捉到的一种独特的理论方法,它是广松涉和马克思视域融合的产物。“四肢结构理论”集中体现了“关系主义”的特征,因此,理解广松涉“四肢结构理论”的建构及其推演过程,是理解广松涉哲学体系的全部内涵的关键所在。并且,广松涉的“四肢结构理论”确实为我们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14JJD720003)暨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NCET-13-02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庆丰(1978-),河南林州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董键铭(1992-),黑龙江哈尔滨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构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原则。

一、《资本论》的“从学理的立场”

马克思的《资本论》汲取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丰富的理论资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马克思把自己的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非“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这就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广松涉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就是从此入手的。

广松涉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而这种不同首先是一种研究立场或方法的不同。广松涉分别将两种立场界定为“从学理的立场”和“从当事者的立场”。在《资本论的哲学》一书中,广松涉借用黑格尔的词汇,区分了研究的两种立场——“从学理的立场(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即für uns[对于我们])”和“从当事者的立场(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即für es[对于他们])”^①。这两种区分是围绕“当事者”概念展开的,因此,“当事者”这一概念对于我们理解这两种不同的立场至关重要。“当事者”指的就是商品交换活动中的双方交换者。在商品交换关系取得普遍性地位的社会中,由于商品交换活动是普遍进行的,因此在交换活动进行之前,商品就已经摆在当事者面前了,他们不需要考虑商品交换何以可能,而是直接面对商品、选择商品。所谓“从当事者的立场”就是指研究者自觉地将意识与当事者保持一致,而“从学理的立场”则是指研究者自觉地从实际行为中抽离出来,将自己的研究意识与当事者分离开来。无论是与当事者保持一致,还是从与当事者分离开来,这里面的“当事者”指的都是“当事者的意识”。“当事者的意识”就是把商品仅仅当作是“商品”,当作是“物”的意识。它不会去反思或探究商品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我们能够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马克思曾经批评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生活时是“见物不见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李嘉图逐一探讨了价值与劳动量及劳动报酬的关系、价值变动与劳动报酬的关系、价值与劳

动工具的关系、价值与价值尺度及货币的关系等等问题^②,却从未对经济活动的主体——人——进行专门研究,即便是在探讨劳动力及劳动报酬的部分,李嘉图也并没有将劳动者视做主体,而是将其视为经济要素、视为某种物来进行研究。他的研究只关心商品的交换比例,乃至劳动力与商品的交换比例,而不关心交换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不可能触及物的掩盖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意识与商品交换活动的当事者是一致的,二者都只关心作为“物”的商品本身。因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从当事者的立场”出发的。即使是在马克思所举的用以论述价值形式的“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例子中,“从当事者的立场”出发的经济学研究也只能看到“有20码麻布这种商品”“有1件上衣这种商品”以及“二者进行了交换”这三个事实,而无法看到“价值形式”“等价形式”等概念。对于李嘉图来说,唯一的问题就在于“20:1这一交换比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李嘉图展开了对价值量的影响因素的具体分析。

如果说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是“见物不见人”的,那么马克思的研究则是“见物又见人”的。在价值形式论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虽然马克思已经刻意地运用了纯粹的商品语言进行探讨,但这种探讨很明显是建立在不同于“当事者”主体的视角的理解基础上的。在“麻布”与“上衣”的交换中,当事者并不能直接看出麻布就是价值形式、上衣就是等价形式。从他们的立场看来,“麻布”就是“麻布”,“上衣”就是“上衣”。“麻布所有者只具有自在的意识态,对他来说,并没有自为地认识到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这种情况。”^③而要想发现麻布是“价值形式”、上衣是“等价形式”,我们就不仅要看到麻布与上衣,而且还要看到麻布所有者与上衣所有者,并意识到将麻布视为价值形式是从麻布所有者的视角出发的,但麻布所有者本人并不具有这一意识,是研究者将这一意识自为化的。因此,揭示出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研究者就必须不仅要能看到商品,而且要能看到商品交换的当事者,并能够自觉地将当事者同商品一样都当作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因此,在马克思这里,研究者的视角与当事者的视角是分开的,“实际上,用‘商品语言’

讨论麻布,是从学理的 für uns 的立场‘听取’(vernehmen),并且,在麻布问题的讨论上,是从麻布所有者一方来建构视角。”^④可见,马克思是“从学理的立场”展开价值形式论研究的,而所谓的“从学理的立场”是一种真正的研究者的视角。

在“从当事者的立场”中,研究者与交换活动的当事者的视角及意识都保持一致,二者都直接面对市场上的各种商品,他们都将商品世界的存在本身视作其思想和行为得以展开的前提。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从当事者的立场”的科学研究是对“当事者”思想和行为的简单重复。“当事者”是以直观的方式把握商品,而“从当事者的立场”出发的研究者则是以理论的方式来把握商品。换句话说,当事者沉浸在日常生活经验中,秉承一种“常识”的思维方式;而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是“从当事者的立场”出发,但却是一种科学的研究,秉承的是理论思维。“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以理论思维去抽象、概括、描述和解释思维对象(存在)的运动规律,也就是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⑤可见,科学思维就是要探求认识对象的运动规律。因此,从亚当·斯密一直到李嘉图的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试图揭示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常识的思维方式,上升到了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李嘉图将之称为追求经济理论而非经济表象的研究方式。

在“从学理的立场”中,研究者的立场与当事者的视角相分离。也就是说,研究者并不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意识与商品交换者的意识保持一致。这样,研究者就可以将当事者日常意识中未经反思的自明性前提本身当作问题进行思考。“对于商品世界中的日常意识来说,商品‘具有交换价值’这件事……好像是极为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内在于商品世界的日常意识来说平淡无奇的这一事态……从反思上看却是问题式的。”^⑥通过“从当事者的立场”到“从学理的立场”这一立场转换,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不证自明的前提就成为了研究和反思的对象。马克思从平淡无奇的商品背后揭示出现代社会的商品拜物教本质;从价值分析当中发现剩余价值的存在;从资本增殖过程中表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所有的这一切都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界限,是对古

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前提批判的结果。用广松涉的语言来表述的话,就是马克思“从学理的立场”出发进行研究的结果。简而言之,如果要对“当事者”“从当事者立场”和“从学理立场”三者进行区分的话,在我看来,它们分别对应的是“常识”“科学”和“哲学”的思维方式。

二、商品世界的四肢结构

广松涉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取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当事者立场”不同的“从学理立场”。广松涉的这一判断是符合马克思本意的,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资本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在明确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前提后,广松涉开始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论述过程进行重新梳理。正是在这一重新梳理的过程中,广松涉提出了“四肢结构”的概念。所谓“四肢”结构,是广松涉的一个比喻。他认为,作为整体的世界结构在我们面前是以分节态而呈现出来的,正如四肢都只是身体的分节的呈现一样。对于世界而言,则是世界的整体结构呈现在客体侧面的“现实性—理想性”二肢与主体侧面的“现实性—理想性”的二肢相互中介而形成的“二肢二重性”的样态中。

在马克思的价值形式论中,广松涉认为商品的客体和主体两个侧面都存在着二肢二重性关系。首先在商品的侧面。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就使用价值而言,马克思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⑦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意味着物具有“有用性”。“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因此使用价值代表了商品的现实性方面,构成了商品世界中客体侧面的现实性方面的一肢;第二,使用价值所体现的不是纯粹的、与人无关的客观性,而是与人有关的“有用性”。物的有用性是使用价值存在的前提,而所谓有用性,必然不是对物而言的有用性,而是对人而言的有用性。因此,使用价值本身虽然体现了客体侧面的现实性的

方面,但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社会性范畴。就商品的价值而言,价值首先是承载于使用价值之上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如果物不具有有用性,那么它也就不具有价值。价值所体现的是商品的非现实性的方面,即理念的方面。但这不代表价值是纯个人的主观想象。“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因此,价值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社会性范畴。价值构成了客体侧面的理念性的一肢,亦即商品侧面的二肢。

商品主体层面的状况与客体侧面是相类似的。广松涉分析道,“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件事情,作为事实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过,若稍加分析,für uns(从学理的立场)具有颇为复杂的结构。”以麻布所有者A的视角而言,上衣所有者B本来是同自己一样的具体的人。然而随着价值形式由简单价值形式过渡到扩大的价值形式,我们会发现,在商品交换关系获得社会普遍性地位的社会中,作为具体的人的B并不必然地出现在交换等式的另一端。“在当前关系中,A所关心的,是上衣这种物(使用价值物),而不是对方B的人格和个性。只要是上衣的生产者和所有者就行,对方的人格等是无关紧要的。”^⑩因此,对A而言,B虽然只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同时也一个“无人格的、抽象的人”。“准确地说,眼前的具体人物B,只是作为相对于A的für sich(自为的)上衣的生产者和所有者这一无个性的所谓常人,在二肢二重性中出现。”^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生动地描述了商品交换者的这种特征。他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⑫因此在这里,A与B二者的事态是共轭的,或者说二者是彼此相对称的。“A只要能够理解B,他就能了解如下情况:对本人而言的自为侧面是作为具体者的人,在他为侧面是作为抽象的人类而出现。”^⑬在这里,具体的人构成了主体侧面的现实性方面的一肢,而抽象的人则构成了主体侧面的理念性方面的一肢。每当我们面对商品生产者时,都会将其把握为“有用劳动的主体作为抽象劳动的主体。”

根据对商品侧面与商品生产者侧面的分析,广松涉认为,“使用价值”“价值”“具体的人”“抽象

的人”,这四者共同构成了商品世界的四肢结构。这四者并非相互分离的,而是作为社会关系的分节态而存在的。在对商品世界的传统理解中,商品内在的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人的劳动既能生产使用价值,又能生产价值,人们将商品视为相同的人类劳动的物质表现形式,并因此进行等价交换。而商品世界的四肢存在结构表明,商品世界并非实体性的存在,而是关系性的存在。无论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都不是商品的天然属性,人类劳动也并不在天然的意义上互相等同,使用价值、价值、具体的人、抽象的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不同侧面的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⑯可见,广松涉对商品世界的关系主义理解,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也是大致相符合的。

随着商品世界的“四肢结构”的揭示,价值唯名论与价值实在论的矛盾也被合理的超越了。广松涉指出,由于商品世界本质上来说是关系性存在,因此价值判断并不以某种实体性存在为评价标准,而是有赖于交互主观的一致性。“某种价值判断是否交互主观的一致的存在,取决于历史的、社会的具体条件。不是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判断与客体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而是取决于社会的总关系的曲折的中介。在此意义上,这应该说是社会的总关系的一个结节。”^⑰在这里,交互主观性的价值判断体现出了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交互主体性原则决定了由社会所形成的主体际的价值判断与个人的主观判断是有可能相背离的,因此交互主观性的价值评价与个人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是不同的。价值唯名论认为单个人的价值评价不具有有效性或通用性,价值只能经验性的在每次交换过程中予以确证。然而,交互主体性是一种社会历史性原则,其所决定的价值判断对个人来说同样具有客观有效性。另一方面,交互主体性原则所决定的价值判断虽然具有客观有效性,“但是,所谓‘具有客观有效性’,不是说价值对象性是客观的实在,或对它的摹写的一

致。这种一对一的对应性是不存在的。”^⑩价值实在论的主要问题就体现在他们根据价值的客观有效性就直接推断出价值实体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形成了对决定价值有效性的社会关系的物象化错认,将作为“结节”的社会关系独立化,从而将其错认为价值实体。

三、全部生活世界的解释原则

通过对马克思价值形式论具体内容的重现,广松涉揭示了商品世界的四肢结构,并超越了价值唯名论与价值实在论的对立。然而,这并不是广松涉解读《资本论》的终极目的。在广松涉看来,商品世界是人类全部生活世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特殊方面,对商品世界的存在结构的揭示为我们分析全部世界的存在结构提供了一个范本。可见,广松涉并不想仅仅满足于对商品世界内在结构的揭示,他还想寻找到全部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及其解释原则。

广松涉认为,我们现实的生活世界与商品世界有很大的相似性。广松涉将我们的生活世界称为“信息世界”,生活世界以信息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的直接视野非常有限,从那里所发现的东西,只不过是若干的‘事物’,几个人,他们所发出的声音,被称为电视、报纸等‘物’中出现的某种形象这样的外延、范围而已。”^⑪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能把握到的绝非这些形象本身。在把握到这些形象的同时,我们也把握到了某些具体形象以上的东西,即我们理解了以具体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信息。“语言”是信息社会传达信息的主要方式。从语言的外部形式的角度,亦即信息世界的客体侧面来讲,在对话过程中,人们所互相传达的只是不同的语音、语调,它们都只是一种单纯的符号。然而对话者双方却能理解这些符号所包含的意义。这里就体现出信息世界与商品世界的相似性:商品在使用价值之上承载着价值,信息在符号形象之上承载着内容与意义。另一方面,信息世界的主体侧面也与商品世界具有相似性。“接收者之所以能够‘理解’符号,是因为传达者与接收者成了应该称为该符号体系(语言)的‘语言主体’。”^⑫因此,对话双方在作为具体的语言符号的表达者的同时,也作为抽象一般意义上的语言主体而存在,这与具体的劳动者同时也作

为抽象的劳动者这一样态是相似的。所以,对商品世界的存在结构的分析也可以相似的适用于对信息世界的分析。“信息世界存在于现实的符号形象作为非现实的信息内容有效,现实的接收者只有作为非现实的语言主体才能展现这样的二重的二肢性,即四肢的构造联系中。”^⑬

随着从商品世界到信息世界的过渡,广松涉的关注领域也从狭隘的商品生产领域扩大到了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类认识领域。广松涉认为,认识的与件^⑯层面以及认识的主体层面,都表现为二肢二重性结构。首先,在认识的客体层面,“现相世界的分节态(=phenomenon)不是单层的与件,它每次都作为映射的所与‘以上的某种东西(etwas Mehr)’,以二肢的二重相来被觉识……现相的分节态每次都是作为‘现相的所与’以上的‘意义的所识’,在二肢的二重性的构造中显现。”^⑭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并且分别表现为纯粹的客观存在与纯粹的主观性。在认识过程中,由于符号本身已经承载了一定的意义,因此作为认识对象的“现相的所与”已经是面向主体而敞开的了,纯粹的客观性存在无异于“存在着的无”。而另一方面,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所形成的认识结果也并不是对认识对象的客观重现,而是已经包含了一定的意义。主体不仅在把握符号的形象,也在理解符号的意义。因此,在与件层面,认识对象总是在作为“现相的所与”以上的“意义的所识”这种状态中向我们显现的。

其次,在认识的主体层面,则体现为“能知的何人”与“能识的某人”的二肢二重性结构。人首先作为认识主体,无论是自我还是他者,都具有认识能力,都可以对现相世界的与件予以把握。“内在于现相世界的,使现相的事态得以归属的‘身体的主我’以及‘身体的客我’,在那是单纯的身体存在以上的某人(所谓精神的能知)这一点上,他是能知的主体。”^⑮但自我与他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事实上二者始终是以共轭的方式出现的,存在于一种独特的二肢的二重态之中。“能知的主体在身体的分节态的相上是人称的个体,相互间形成一种特有的关系。在这种特有的关系性中,那是个体的能知(能知的何人)以上的某人(能识的某人)。人称的各种个体,只要是能知的

主体,那么就作为‘能知的何人以上的能识的某人’,以‘实在的、理念的’二肢的二重态的相而实际存在。”²²“能知的何人”强调的是认识主体对现相与件的把握,而“能识的某人”强调的是在主体际的层面上认识到主体间意义的同一性。因此,“能知的各个主体具有人称的个别性(即主体际的为他的区别性),同时也是在同一相的某人(即主体际的为他的、相互的同一者)。”²³这样,现相的与件层面与认识的主体层面共同构成现相世界的四肢结构。“现相的所知的二肢的二重性(‘现相的所与—意义的所识’)和能知的主体的二肢的二重性(‘能知的何人—能识的某人’)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互关联,总同形成四肢的构造连环。——非实在的‘意义所识’以及‘能识的某人’在这个四肢的相互中介性的构造中获得持存性。”²⁴

当然,广松涉也不满足于对认识领域的四肢结构的分析。在他看来,“‘认识的世界’即‘针对认知的关心态势而展现的世界’,只不过是在舍弃如实的实践的世界中的实践的关心性这一点上作为方法论而被抽出来的东西而已,可以说那原本无非是‘实践的世界的一个相面’。”²⁵自此,广松涉的关注对象由认识领域进一步转入实践领域。对于商品世界的研究聚焦于商品生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在马克思看来都是“生产”,生产本身就已经具有了实践的意义。因此实践领域的四肢结构也可通过对商品世界的类比而得出。在客体侧面,现实性方面不仅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任何实在的对人敞开的特性;理想性方面不仅表现为商品的价值,也表现为类似于价值的意义。与此相应,实践的世界中的客体侧面表现为“实在的所与”与“意义的价值”的二肢二重性。主体侧面的情况也是一样,人首先作为具体的行为主体,是为“能为者谁”,但与此同时,人也充当了实践中的某类抽象主体。这里的情况稍复杂于商品世界,因为在商品世界中,人们所从事的只是生产活动,因而抽象的人只要能输出一般人类劳动就足以满足其理论需求。然而人的实践则是多种多样的,人不仅从事生产活动,也从事各种各样的其他活动。因此无论在何种活动中,主体侧面的理念性方面都需要能够输出该活动的某种特殊能力才能符合实践

领域的理论要求。因此,在实践领域中,主体侧面的理念性方面体现为“角色性格者某人”,根据社会所赋予的不同社会角色,而代表了不同社会角色上的抽象的人。所以,实践的世界的主体方面表现为“能为者谁”与“角色性格者某人”的二肢二重性。客体侧面的“实在的所与”与“意义的价值”,主体侧面的“能为者谁”与“角色性格者某人”,共同构成了实践世界的四肢结构。

随着商品世界的存在结构向整个人类生活世界的推广,价值判断的交互主体性原则便获得了普遍性地位,任何意义与价值判断的有效性都要依赖于交互主观的一致性,因而社会关系便获得了本体论的地位,它既是对象的意义能否被理解的依据,也是人对对象会形成何种理解的依据;既决定了个别的行为,也决定了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准,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都获得了社会的规定性。人在实践中改造自然界,赋予自然以社会规定性,将自然而然的自然界转化为属人的自然界、交互主体化的自然界。正是基于这一点,广松涉认为,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应该被转变为“在历史世界中”,世界本身就是历史世界。从商品世界,到信息世界、到认识的世界,再到实践世界,在广松涉看来,“四肢结构”理论都是一以贯之的。

“四肢结构理论”是广松涉在解读《资本论》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那么它和广松涉的“物象化理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四肢结构理论只有在和物象化理论的关联中才能把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揭示出来。广松涉指出,“社会——也包括被文明化的自然——环境的世界是走在前面的别人的行为及其样式被物象化的产物,那成为与人们的演技相对应的舞台以及道具这样的已知条件,而且它基本上制约情节,另外还作为外在拘束的‘客观’制约力对某种‘形式’的演技进行制约。”²⁶按照广松涉的观点,现代社会是“被物象化的产物”,但同时其内在的本质性结构是一种“四肢结构”。换句话说,“四肢结构理论”构成了“物象化理论”的真实内容,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正是“现代社会”。因此,如果将广松哲学与现代社会,尤其是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发展状况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四肢结构理论”所建构的关系主义世界构图对于我

们理解现代社会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其实,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对现在社会做出了本质性的判断。马克思指出:“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②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桑德尔更是明确地把这种社会称为“市场社会”。按照桑德尔的判断,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市场及其所倡导的价值原则对我们生活世界的侵蚀。桑德尔告诫我们,资本发展遵循市场原则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一种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将有可能从“市场经济”滑向“市场社会”。“这里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工具——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市场价值观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市场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加以改变的社会。”^③实际上,桑德尔“市场社会”的本质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指认的“商品拜物教”,也就是广松涉所谓的“被物象化”的社会。从广松涉的四肢结构理论出发,现代社会的“物象化图景”将会更加清晰地向我们呈现出来。

实践的世界中的客体侧面表现为“实在的所与”与“意义的价值”的二肢二重性。在现代社会中,“实在的所与”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所有一切都变成了可以用来交换的“商品”,一切都待价而沽;“意义的价值”意味着商品的价值成为了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和尺度,一件东西如果不具备“交换价值”,那么它也就不具备任何价值。实践世界的主体侧面表现为作为具体的行为主体的“能为者谁”和作为某类抽象主体的“角色性格者某人”。在现代社会中,人作为具体的行为主体,由于分工的细化,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行为主体的类别更加多样;作为某类抽象主体本来是“角色性格者某人”,根据社会所赋予的不同社会角色,而代表了不同社会角色上的抽象的人。但是,现代社会中的抽象主体却变得更加抽象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将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犹太人。在这里,“犹太人”就是现代社会中抽象主体的隐喻:一个拜金主义者,一个深陷商品拜物教中的人,一个完全被物化的人。

从“四肢结构”的相互关系来看现代社会,我

们将会发现:市场原则对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蚀,实质上就是人类生活世界的主体侧面的二肢被客体侧面的二肢所掩盖或遮蔽了,从而产生了广松涉所指出的物象化错认。因此,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被物象化了的、真实存在处于被遮蔽状态中的非本真社会。可见,广松涉解读马克思《资本论》最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就在于他揭示了现代社会作为物象化产物的内在结构。

同样,从广松涉的“四肢结构”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我们将有可能寻找到一条独特的超越物象化社会的道路。客体侧面的对象实体和对象价值与主体侧面的具体主体和抽象主体共同构成了实践世界的四肢结构。正是由于客体侧面和主体侧面分别遵循着不同的价值原则,也因此才构成了世界的两个不同侧面。就像我们不能将两个上肢的原则应用到两个下肢上去一样,客体侧面的原则也不能侵蚀到主体侧面的原则上去。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原则及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绝不能被完全应用到人类的生活领域,我们的社会绝对不能彻底沦落为“市场社会”。客体领域的市场规范是一种较低的规范形式,因为它并不涉及到当事者的人格或品行,而主体领域的规范要遵循一种较高的道德规范。市场原则侵入社会生活领域,事实上就是用市场规范代替了某领域中原有的较高的社会规范。因此,规避物象化社会的重要方法就是保持四肢结构的均衡状态,尤其是在主体侧面和客体侧面之间保持清醒的边界意识。

可见,现代世界的物象化背后实际上隐藏的是一个价值判断(规范形式)的问题。市场原则侵蚀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是价值判断标准的入侵。在客体侧面,货币是一种理性化的、可定量的价值衡量工具,衡量商品的价值和实现商品的流通是货币最为重要的职能。市场原则之所以能够侵蚀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因为在主体侧面人们缺乏有效的价值判断标准。合理的扬弃市场社会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更为方便合理的价值判断方式,而这也正是一个关系主义的世界构图所为我们提供的。交互主体性的价值判断既是属于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同时也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价值判断既不会掩盖主体侧面,也不会掩盖客体侧面,而是在四肢的相互关系中得以达成。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价值判断原

则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纠偏市场经济的唯利原则,使我们的经济成为一种到的经济或伦理经济,它的确立将切实的有助于我们超越市场社会。^⑩

注释:

①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②参见彼得·斯拉法主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郭大力、王亚南译,1962年版,第7—41页。

③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④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

⑤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年版,第64页。

⑥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⑩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⑪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⑫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

⑬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⑭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⑯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

⑰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

⑱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⑲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⑳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3页。

㉑“与件”这一概念是广松涉在《存在与意义》中所使用的一个独特的概念,广松涉用它来指称“认识的对象”或“认识的客体”。“与件”就是被给予的材料或东西,在笔者看来,“与件”类似于现象学中“被给予”给主体的“现象”。

㉒广松涉:《存在与意义》(第一卷),彭曦、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㉓广松涉:《存在与意义》(第一卷),彭曦、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㉔广松涉:《存在与意义》(第一卷),彭曦、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㉕广松涉:《存在与意义》(第一卷),彭曦、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㉖广松涉:《存在与意义》(第一卷),彭曦、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㉗广松涉:《存在与意义》(第二卷),彭曦、何鉴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㉘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5页。

㉚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邓正来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VIII页。

㉛我们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广松涉所倡导的交互主体性原则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关于主体间性的思考异曲同工,至于交互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如何达成,则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长春 130012)

(责任编辑:刘君)